

胡风研究

胡风的理论问题解析 (下)

王丽丽

四、两套话语的独白

胡风对“政治”歧义的取舍表现了一种道德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鲁迅对“政治”所采取的道德态度一脉相承。林毓生认为：“在儒教中国，政治从来不曾被看做一个独立的领域，在此领域当中，政治家的行为应该由韦伯(Max Weber)所说的‘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来评判。”这一点甚至连鲁迅都未能幸免。鲁迅在他意识的底层，仍旧自然地承袭了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或者“认可儒家的政治思想，认为政治是基于信念伦理而追求道德的目的”，或者“承认法家对政治本性的理解，以为政治乃是为了不道德的目的而采取的不道德的行动”。总之，“对鲁迅而言，政治要么是道德的，要么是不道德的，但从来不是非道德的”。“由于缺乏一个智性的范畴能够按照责任伦理来看待政治的某些方面，鲁迅只能将政治的本性视作一种由全无心肝之徒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而玩弄的永恒游戏”。对鲁迅而言，这种肮脏的游戏“更应该受到谴责而不是参与其中”。“鲁迅对政治的极度不赞同甚至

阻止了他试图去了解政治的复杂性，一旦鲁迅彻底否弃了政治，他只能将政治当做政治拒绝之，或将政治不当做政治而接受之”。^①鲁迅的这一遗产也被胡风忠实地继承，胡风反复申明他的政治概念与“政府”、“政治家”这一类名词的含义不同，就是要表明他对政治的态度，大致类似于鲁迅“不把政治当做政治而接受”。李欧梵指出，鲁迅式的对政治的道德化理解必然会和“职业的政治家”发生冲突，因为道德逻辑“不容许任何的机变权诈和实用主义”。^②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的道德化理解就是要求政治动机的纯洁化和政治运作的理想化。这在诸如韦伯这样的思想清明的政治伦理学家的眼里，恰恰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因为政治领域里的真实情况远远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那么简单，而是往往恰好相反。因此，在这一相对独立的领域里，政治行为不应该总是纯粹按照道德来裁决。责任伦理的信徒必须敏感地意识到世界的无理性和不完美，意识到最美好的动机也可能带来与原初动机完全相反的结果。为此，只要行为者对自己行为的可见后果负责，当他经验地意识到某些行为可以导致预期道德目的的部分实现的时候，他就可以采取折衷，运用在道德纯洁主义者看来可疑的、但从政治独立的视角来看属于中性的手段。^③韦伯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胡风事件演变的原因，因为十分显然，强烈的道德倾向不可否认的正是胡风多次卷入理论论争的重要因素，更是后来接受意识形态“询唤”的重要障碍。

由于对政治的道德化也即理想化理解，胡风对“政治”目标的期许就较一般人高远。他惟恐完整美好的政治理想被急功近利地支解、割裂以致偏离了正确方向，最后所得的结果难免应验了一句古老的格言“期乎上，得乎其中”，于是就不停地提醒、告戒、呼吁人们切莫在这方面调和折衷打某种折扣，以保证理想之光不至于黯淡，美好的预期一点也不走样，其精诚绝对不亚于啼血的杜鹃。而常常被胡风引作典范的则是与他一样道德地看待政治

的鲁迅。1937年，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胡风特意把鲁迅对“解放”和“进步”的并重作为鲁迅精神的重要基点做了强调。^④1938年，在抗战如火如荼之际，胡风明知要冒着被人指责为“浪费民众的力量”、“妨害战争”、“汉奸”的危险，强烈呼吁“普及”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提高”，着眼于培养、推进国人的现代思维。^⑤不知是否与那场尘埃甫定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有关，1941年8月，胡风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对权变，提倡鲁迅先生勇往直前的精神。^⑥

胡风对“政治”目标的高远期许也使他对抗战胜利的看法不同。在1947年元旦发表的《在上海》一文中，胡风一开篇就语气沉重地说：“我的笔写不下‘胜利’这两个字”，因此只好用“外战结束”这一说法代替。^⑦在几天后为自己的批评文集《逆流的日子》所写的序言中，胡风对这种沉重的心情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早在抗战结束前夕，作为批评家的胡风就感应到了埋藏在中国人民兴奋里的忧虑，“苦恼着将要到来的胜利不能是真正的胜利，苦恼着民族解放应以人民解放为真实内容的这神圣任务正受着极大的妨害”。胡风之所以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逆流的日子》，就是因为他觉得，抗战结束以后的事实不幸证实了他的预感：“封建买办阶级所造成的政治逆流背叛了民族战争的神圣使命，保护了甚至培养了封建罪恶，妨碍了甚至残害了人民力量。”如果说，胡风对政治上的“逆流”的批判还明确指向国民党统治的话，那么胡风对文艺“逆流”的指斥则不可避免地要触及自己阵营里的人。胡风指出，本应“为人民代言”、成为“向着逆流的胴体刺击的武器”的新文艺，“在自己的阵营里面也经验着一种逆流的袭击”，泛滥着“虚伪的声音，空洞的叫喊，冷淡的形象，以致腐烂的彩色”。“新文艺的热情的战斗的传统精神就临到了致命的考验。”^⑧

1948年底，避居香港的胡风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春天”的气息临近了。其时，胡风的批判

者、在港的其他左翼文化人都忙于根据时代的巨大转折调整自身和“文艺的新方向”，似乎只有备受围攻的胡风一人，独独把毛泽东的“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这句话当了真，在胜利到来的前夕，就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警世通言”：“春天，叶绿了，花开了，这是快乐的季节，但花要结果，果要成熟，快乐的季节的另一个意义就应该是，更要打起精神和残冬作战，就要开始斩拔野草，清除碎石，消灭害虫，让五谷的生机充分发育成长的、辛劳的流汗的耕耘。”^⑨胡风这里所说的“残冬”具有明确的所指，就是他一贯警惕的“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意识”这些“深厚的历史负担”。胡风觉得极有必要在胜利了的幸福时刻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了它们那种“似无实有、似弱实强”的存在。

如果说，胡风在抗战时期不接受权变，坚持以反封建来保证反帝、用“进步”争取“解放”的呼吁还只是显得与主流不甚协调，在抗战结束之后拒不言胜利也只是向反动当局示威的话，那么，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胡风仍然动辄强调要与“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意识”继续作“毒蛇怨鬼似的搏斗”、^⑩提倡像鲁迅一样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和“对于人民身上的封建创伤的痛切感受”^⑪融合在一起，则不免显得大大的不合时宜。仿佛对自己依然故我的态度之不合时宜有所感觉，胡风在1954年的一次讲演中还特意谈到鲁迅杂文的一个基本战斗精神，区分“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热讽”。胡风强调指出，鲁迅的攻击是有情的。“所谓有情就是有所为。为什么呢？为民族的命运和人类的解放。这和冷嘲者不同，冷嘲者是站在旁边说风凉话，颠倒是非，觉得世事无一可为、无一可取。冷嘲虽然和热讽只隔一层纸，但却是完全相反的。”^⑫事实证明，胡风的表白无疑是真诚的。但对当时仍然绷紧着战时神经、一心迫切地希望为立基未稳的新生政权进行意识形态合法化、恨不能喜鹊满天的领导者来说，胡风那些自称有情的热讽仍然无异于鸦噪和枭鸣，听起来格外刺耳。况且，在政治家眼里，衡

量真诚的标准只能看历史表现,而胡风在历次理论论争中,均表现出了与“我们”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至于鲁迅所使用的划分标准“情”,更是经不起严格的阶级观点审查的暧昧之物,原因很简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决不会同无产阶级之情。胡风的真诚几乎达到了“慎独”的传统道德标准,但政治却必须时刻将人性中“伪诈”的因素考虑在内。冲突的结果是,胡风的讲演被束之高阁,一直封存到80年代才与世人首次见面。

同时被封存的还有胡风其他的文章。在胡风晚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就有多篇并不真是胡风晚年的新作,而是胡风写于50年代而当时没有机会面世的作品。比如《学习鲁迅精神》一文,就写成于1951年,而初次发表于整整三十年后。这并不是说胡风的这些文章确乎存在着什么错误。在意识形态解码后的今天,胡风的这些文章毋宁说还显示了某种思想的清晰性和深刻性,但在当时,它们却确实实是文学统一部署和行动所难以整合的因素。在对胡风事件的详细考察中,我们屡屡可以看到在胡风和他的批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对峙,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件事,但却是从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依据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自然,他们都坚持自己的结论,而对对方的思路表示难以理解。这样的例子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现实主义”、“政治”以外,还突出表现在他们在多个问题上相互指责。在看待思想改造和创作问题上,他们都嘲笑对方选择的道路“最省事”。主张思想改造的道路只能是参加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列主义的林默涵和何其芳认为,胡风主张作家的思想改造可以不脱离创作实践而完成,这无疑是“最省事”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深入实际斗争转变情感才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磨练过程,而学习马列主义更是永无止境之事;而胡风则认为,只有在创作实践中,作家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材料和他对这些材料的理解和思想感情,才可能“进行一场相生相克的决死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作家的精神才可能“伴着肉

体的痛楚”获得扩展，从而完成思想改造。如果认为创作过程与思想改造无关，仅仅只是运用先验的“世界观”，把搜集来的材料记录下来而已，这才是“最省事”。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批判者认定胡风所走的是一条政治还原之路，但殊不知，在胡风看来，批判者们离开了文艺实践的特殊规律来领导文艺实践，在文艺领域内简单“依仗政治”，从“文艺实践是依存于政治或生活实践”的“有机关联”的角度看，也“就叫做脱离了政治”。^⑬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虽说胡风和他的批判者在理论上交手多次，但彼此之间仍然十分隔膜；无数次的个别谈话、集体座谈甚至批判教育，也不就等于双方之间得到了一定的交流。从头至尾，双方更像是各自依据一套话语在进行喋喋不休的独白。说是独白还不是十分恰当，因为奇怪的是，仿佛有某种无形的东西阻挡在胡风和他的批判者之间，让他们各自的独白在对方耳朵里听而不闻。这种无形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也屏障着我们今天对胡风思想和胡风事件的重新理解。当胡风思想在80年代走出幽闭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个文论与美学的宝藏。它们与人们已经厌倦的文学的工具论一套截然不同，在许多方面甚至仿佛专门为纠正工具论之弊而设计。同时人们还发现，文坛在80年代涌起的多种所谓“新”思潮，如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主体性”提倡，如果联系到胡风文艺思想，都可以在胡风那里听到历史的共鸣。此外，在劫后余生的人们小心翼翼地鼓足勇气，准备向文坛痼疾发起挑战的时候，他们发现胡风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将他们的壮志付诸于实施，高度概括的“五把刀子”论将左倾机械的文艺理论的弊端分析得淋漓尽致。于是，胡风在人们的眼里自然戴上了先知兼勇士的光环。这就决定了80年代初期的胡风研究，不采取仰观的视角也难。但历史的必然性并不等于充分的合理性。在人们欣喜地庆幸发现历史宝藏的同时，他们忘了接着追问，这一宝藏在当时何以被弃

置、封存起来，需要等到几十年后重新发现？一句周扬对胡风嫉贤妒能的解释就足够使人们心头郁积的众多疑团一一释然吗？为了解答这一类疑问，我们或许有必要对胡风的“三十万言”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

有这样一种说法颇堪怀疑。这种说法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一直零散而缺少系统，多亏有了《论现实主义的路》和《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两个长篇大作，胡风才得以将他散落在凌乱篇什中的真知灼见发展、整理成独特的体系。还有不少的研究者甚至干脆将这两篇长文作为研究胡风理论的标准文本，借以一窥胡风思想的全貌。自然，这些做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免有点错将无奈当做幸运的味道。毕竟，这两篇长文都只是胡风出于被迫所作的答辩。答辩的功能就决定了被动回应的成分多于主动建构的成分。且不说胡风本人在写作这两篇长文的时候是如何的感到苦不堪言，单就理论收获而论，其创新的意义也十分有限。如果说，《论现实主义的路》在批判者理论的映衬之下还多少凸显了胡风理论的人道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在“三十万言”中，除了出于申辩和反驳的策略需要，旁征博引苏联的文坛资料和革命导师的语录之外，究竟有多少思想不是胡风一贯有之而出于新创的呢？恐怕寥寥无几。^⑭况且，严格地说“三十万言”并不是胡风一人所作，在胡风准备这一报告的时候，有多位后来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朋友全程参与了酝酿、讨论和修改，甚至“五把刀子”这一尖锐的说法最初也不是胡风本人提出的，而是临时听从了一个朋友的建议改的。^⑮确实，整个“三十万言”明显具有内在的逻辑，理论思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但这大半是因为林默涵和何其芳已经根据《讲话》的逻辑为胡风设计好了题目，胡风只不过按题答卷而已。当然，由于胡风对每一个问题的解释和申辩都竭尽全力，而且对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大抵坚持，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在“三十万言”中窥见胡风文艺思想

的大致形貌，但这一形貌显然与胡风思想的原生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

但“三十万言”也确实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典型文本。80年代已有研究者，通过对“三十万言”的细致阅读以及对双方观点和理论逻辑的仔细考辩指出，在“主观战斗精神”、题材、世界观和创作、“精神奴役的创伤”、文学遗产以及民族形式六个问题上，胡风除了在后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人所共知的偏颇之外，对其余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在今天仍然经得起反复推敲。而相反，胡风“批评者的所有批评”，却“几乎是没有什么是一言之成理，具有说服力的”，^⑩张冠李戴、偏离主题等明显错误随处可见。尚延龄的这一阅读感受基本上是符合“三十万言”实际的。有人指出，胡风最后的上书是“困兽犹斗”，这也是实情，但如果胡风没有理论上取胜的自信，即使是孤注一掷，多少学得一点鲁迅“壕堑战”战术的他至少也应该在策略上注意保存自己，而不至于贸然行动。其实，胡风何止于仅仅具有一定的理论自信，他几乎是确保了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万无一失。根据绿原先生的回忆，胡风在撰写“三十万言”的时候，为了保证理论上的稳妥和坚实，反复与朋友们交换意见，将“写成的一章一节原稿交给几个朋友看，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经过自己斟酌加以修改或补充”。“他仿佛预感到日后可能发生进一步简单化的曲解，曾经就林、何文章的批判重点，多次和朋友们一起进行过模拟式的答辩”。^⑪在历次的理论交锋中，胡风都表现出了较批判者强得多的理论能力，经过如此精心的准备，“三十万言”更是显示出了令对手难以抵挡的雄辩的气势，但上书的结果却以胡风的彻底失败告终。这一结果似乎不得不让人思考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胡风变得越来越雄辩，并且在“三十万言”中恰当地指出其理论对手自相矛盾、违背文学史常识之处无数，但丝毫都无助于改变其处于劣势的地位，仿佛胡风的雄辩仅仅标示出了其处境的恶劣，需要反复大声地为自己申辩。更有

可能的是，根本就没有人准备对胡风的申辩认真地倾听，胡风百般辩解，就形同面对铁壁。这才是胡风真正的悲哀。一开始，胡风与他的批判者就不是处于一种平等争论的地位，批判者尽管难以从理论上令胡风心悦诚服，但却有足够的权力将胡风的思想包裹起来，在胡风的理论之外建立起一重铜墙铁壁。胡风事件的结束，并不是以胡风和批判者分别代表的两套话语中的一套征服或说服另一套的结果，而只是以其中符合当时意识形态要求的批判者的话语借助国家机器，宣布另一套话语为非法并将其封存而告终。

今天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断言，当年包裹着胡风思想的坚硬外壳就是其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几十年以来，它已经与被它严密缠裹的胡风思想粘合、锈蚀在一起，使得人们长期难以窥见胡风思想的合理内核。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随着意识形态遮蔽的消失，后来的研究者开始责怪既往历史对胡风思想的有眼无珠。这实际上对我们重新理解胡风事件又造成了另一种遮蔽，这种对业已解码的意识形态遮蔽的遗忘和无视又必然使人们难以理解，胡风当年出于一片赤诚，披肝沥胆地献上自己的文艺理论这一和氏之璧，却何以反遭贬黜和严惩？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十万言”对研究者而言，也很可能变成一个陷阱，稍有不慎，就会陷将进去，一味被胡风的理论牵着鼻子走。我并不是在暗示胡风多么的巧言令色，因为胡风本来就有足够的理论能力和理论准备，而是指出，研究者有责任选择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洞见胡风当年的盲区。至少，“三十万言”所昭示的胡风的理论自信与准备同他最后得到的实际处境之间的强烈反差，就足以提示我们，纯粹从检讨胡风的理论破绽入手来追踪胡风事件的起因此路不通。

五、知识分子思维的“明”与“昧”

胡风对政治的道德化理解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共同特性。

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论及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永恒批判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的，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⑩鲁迅所处的时代无疑是一个乱象丛生的时代，但即便是在社会繁荣发达之际，这种批判精神仍然难能可贵。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居安思危、苦苦思虑着如何使社会发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种永不满足的否定精神正是知识分子批判特性的突出表现，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选择，社会没有义务对之感恩戴德或者喝彩。对政治家而言，在某些时候他可能愿意倾听、借鉴知识分子的盛世危言，至少容忍这些不和谐之音。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也时或难免。在建国前后这一个特殊时期，战争思维还绷紧着政治家的神经，他们很容易分辨不清善意的忠告和蓄意的攻击。

尽管从建国前后开始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进行阶级和意识形态规训，但胡风似乎是最“顽固地”保持着知识分子学理推论的思维习惯的少数人之一。他几乎大半辈子背着“对抗《讲话》”的罪名，为此度过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但直至出狱前夕，他依然坚持从学理上对建国之初文艺界领导庸俗化《讲话》给文艺事业造成的多处“内伤”做了清晰地剖析：突出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本来是《讲话》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丢掉了也为知识分子”服务，却“也是违反原则，违反实际要求的”，这是理论内伤之一；理论内伤之二在于“把应该肯定和鼓励但也应该用保留态度对待的农民文艺也当做无产阶级文艺，甚至定为‘方向’”。第三处严重理论内伤表现在，对于文艺本身问题，许多人“只抓住‘共性’以自恃而阉割了以致窒息了个性”；最根本的内伤则在于，将在延安那种“类似半军事共产主义的具体条件下”制定

的文艺方针，不加任何改动地移用到解放后的文坛。^{①9}胡风思想所蕴涵的理论能量着实令人惊叹，他从科学分析角度对《讲话》的批评也可谓一针见血，但《讲话》从它产生的实际背景看，却更多地属于具体政治家“对实际政治问题所持的意见”，就本质意义而言，它同学者对具体政策所作的学理分析“完全是两码事”。韦伯这样描述政治家对意见的表达：“在这种场合，立场鲜明甚至是一个人难以推卸的责任。这里所用的词语，不是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将其他人的政治态度争取过来的手段。它们不是为深思熟虑疏松土壤的铧犁，而是对付敌手的利剑，是战斗的工具。”^{②0}显然，用韦伯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讲话》似乎更加合适。除了思维方式保持不变以外，胡风的行为方式也突出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本色。胡风在解放后的所作所为，都被批判者夸大地称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②1}，但实际上，胡风惟一“能做的，也还是从理论上去做‘挖心战’”。^{②2}胡风所用的词汇倒真的如“五把刀子”一般寒光闪闪，但实际上还是书生气十足的纸上谈兵，面对批判者的步步进逼一筹莫展。

在胡风事件整个事态的发展中，作为当事者的胡风自己也多有反省。早在香港批判之后，胡风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从现象来看，他们倒群趋‘政治’，而我们倒是沾沾于文化、思想领域的。”^{②3}他在“三十万言”中的自我认识具体体现在以下各处：尽管二十多年以来，自己一直追随着党的事业，但“对于严格的党内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式”，却是“完全生疏的”，因此可能由于无知对组织犯了态度错误；由于自己对文艺的一片拳拳之心屡屡得不到批判者的理解，胡风也曾自忖：“我觉得我对于实践情况的担心和文艺领导上的总的估计总的步骤是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我的心情才这样不能被同志们所察觉和注意”；胡风甚至认识到了林默涵给现实主义划分“阶级成分”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弄到把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现实主义当做了意识形态本身”。^{②4}即便

在自我批判中，胡风也不无抓住要害之语：“我过去一直用毛主席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指示来替自己的局限性和错误立场辩护，但今天，‘环境和任务的区别’已不存在，我的错误便更鲜明地暴露出来了。”^{②5}在《简述收获》中，胡风着重转入人事因素的检讨。他认识到在“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中，由于在批判向林冰的同时，还涉及到了国统区的左翼文化旗手、延安的文艺领导人和当时党的重要理论家，客观上“损伤了他们的政治威信”，对进步事业造成一定的反作用。对人事方面的失策，胡风有一实质性的总结：“都是从狭隘的实践观点出发，不能从当时政治需要的全局观点对待问题。”^{②6}当然，胡风的自省在关键问题上也有估计失误的时候，这就是他“一直毫不怀疑党中央基本上是信任”他的。^{②7}这一估计直接增加了事件的悲剧意味。

作为一个思维敏锐的理论家，胡风的自省几乎道出了事件发生的所有关键因素，而且内在颇有逻辑联系：首先是态度问题，其次是艺术方法与意识形态发生歧异，而这直接与时代的转换有关。此外，无论是文艺理论问题，还是人事的纠缠，在在都表现了学术追求与政治考虑的难以统一。但有意思的是，胡风对世事的洞察并没有加速他随顺潮流、接受意识形态的询唤，相反，很可能还使他在更清醒的状态下坚定了内心深处对文学立场的持守。因为在所有胡风这些自我反省的言语之间，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一种理智认识和感情认同之间的紧张和悖反。对于这些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实际情况，胡风或是大不以为然，或是本来就持否定态度，或是觉得自己的选择情有可原，反正都不足于使胡风从内心里彻底信服。

其实，早在香港批判之后，乔冠华就几次暗示胡风尽快解决问题，然后大家可以一同努力把文艺运动推进。在1953年林默涵的批评文章发表以后，乔冠华甚至把话说得不能再明白了：“我觉得，把问题摊开来谈，花几天工夫一定可以谈清楚。我觉得，这

个关一定可以过去。”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胡风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迂执”的一面，他在谈话的当时均没能仔细体会乔冠华的隐衷，不是没把乔冠华的暗示当回事，就是当面抢白乔冠华“过关”的说法，待到他自己品味出乔冠华话中的好意的时候，已是在监狱里交代自己与乔冠华关系始末的时候。²⁸尽管胡风这种认死理的思维习性注定了解放后对他的意识形态“询唤”过程必然要经过一波三折，但不管怎样，即便迟钝如胡风者，也能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询唤”的迹象。1952年5月，胡风在彭柏山的建议下，在《讲话》发表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撰文对《讲话》表示态度，但这篇题为《学习，为了实践》的学习体会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取而代之的却是舒芜那篇著名的“起义”檄文。周扬对此的解释是胡风的文章“没有自我批评”，实际上则是因为胡风不该在文章中“大骂”了一通公式主义。²⁹不可否认，周扬的否定无疑会在胡风的心中唤起历史恩怨的不佳联想，但据此认定胡风接受询唤之路就此被周扬堵死也是大谬不然。因为据胡风自己回忆，就在体会之文发表受挫之后不久，胡风曾经有一次在剧场邂逅胡乔木，胡乔木仍然嘱咐胡风“顶好抓紧时间，国家要人”。胡乔木还明确对胡风表示：“他们（指当时所谓“帮助”胡风检查理论问题的人——笔者注）没有什么，我是说你自己……”胡风在事隔多年之后也体会到当时胡乔木应该是希望他“写一个检讨过关，马上要求入党的”。³⁰在随后召开的1952年底的四次讨论会中，尽管周扬“完全不容讨论的口气”给胡风的情绪以很大的打击，但有一点仍然很清楚，检查文艺理论只是形式，重要的是态度。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朋友提醒胡风的那样：“别人提意见也提不出什么的，开会不过是形式，不要以为意见提得那样严重就真是那样，还是就可以检讨的检讨”；并且指出，检讨了不会对胡风苛求，但不检讨就决不能解决组织问题，除非从此搁笔。这完全是“询唤”的要求，而不是理论探讨的架势。在第一次讨论会之后，胡风所写的检查文

章《一段时间，几点回忆》之所以再度被压下，而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两人的批评代替，又是因为胡风仍然在“文章里做了解释”。尽管批判者们不便于向胡风直接宣布，但胡风实际上也可以辗转了解到他们的原则：“只准检讨，不能解释或讨论”。但即便如此，在发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文章之后，林默涵仍然希望胡风“表示态度，甚至说，写一封简单的信发表一下也好”。

至此，胡风的人格开始在绝境中受到检测，因为情况已经再清楚不过：一方面，批判者坚信“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问题只是等着胡风“表示同意”，^①而且周扬也说了：“胡风只要检讨，工作不成问题”；^②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再准备给胡风留下任何拖延、回旋或选择的空间：“不能马上绝对服从就一定要把问题更扩大。”^③就是在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胡风的知识分子本色充分表露无遗：很显然，不接受“询唤”就没有任何出路，但胡风始终坚持：“我不能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决不能把自己的手说成是狗爪子。”^④同时，胡风敏锐的艺术感觉偏偏还清醒地告诉他，以主要批判者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所代表的理论实质，正是几年以来在文艺实践中起了严重的危害作用的一种力量”。如果继续执行，一定“要在已经陷入困难情况的文艺实践上产生严重的后果”。胡风顿时觉得自己“对于历史要求对于党”的沉重的责任感超过了对自己问题的担忧，于是不顾自己已是戴罪之身，仍然十分不识趣地操起犀利的批评武器，为争取作家适宜的成长环境而战斗。

胡风的表现现在批判者眼里一定十分“迂执”，这种“迂执”决定了他在某些方面有所明的同时，也决定了他在另一些方面必然有所昧。比如胡风就对批判者忽而宣称“就是要算旧账”，忽而又说“不是算旧账”感到极度困惑、无所适从，最后认定了“结果完全是算旧账”。其实，胡风始终都不曾参透这里面的奥秘。旧账自然是非算不可的，但决不是如胡风所期待的那样，把抗战前期、抗战

后期和解放前这三个时期所牵涉到的所有人的“理论、做法、成果”关联起来,进行全盘清算,因为其他人都早已“过关”了,所以也就没有再算旧账的必要。胡风几乎是仅剩的一个顽固堡垒,因此必须把他“一个人的问题抽象出来”。算旧账显然也不是为了与越来越雄辩的理论家胡风展开什么学理的讨论,而是列数政治前科,以激起被清算者的负疚感,从而促使被清算者痛下脱胎换骨之决心。批判者在斤斤计较于旧账的过程当中,目光似乎是朝后看,但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向前看,算一个人以前的旧账是为了换取这个人以后对意识形态的臣服。这就叫做既算旧账又不算旧账。而胡风却始终拘泥于解释“环境和任务”的区别,为算旧账而算旧账,那当然只能越算越糊涂。当然,胡风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另一个“有所昧”,就是过分固执地把自己的问题认为是与周扬等人的对立,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他对整个事件性质的理解,影响了他在采取重大举措之前的决策。很难说,胡风如果早一些去除了这一层人事的“蔽障”,就一定会顺利接受意识形态的“询唤”,至少“三十万言”跟现在我们所见的样子会有不少的差别,因为毋庸讳言,胡风上书“三十万言”的意图之一,就是要跟“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文坛宗派主义统治一决雌雄。^⑤

胡风在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和局限,都不过是从正反两方面集中体现了胡风的知识分子学术人格而已。对于胡风在文学事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和痴迷,四川省劳改局的“贺处长”在1976年一言以蔽之曰“职业病”。这一旁观者的概括顿时让胡风产生一种醍醐灌顶之感,深切地意识到“根深蒂固的职业病”正是给自己酿成悲剧的“主观上的根本原因”。这种职业病具体表现为对事对人的“偏好偏恶”上。首先是阅读嗜好中表现出来的口味之“苛”。胡风自述:“如果不能吸引我的感情,就不愿读下去,以致不能读下去”,“感情虚伪、轻浮、以致恶劣”的作品固然不肯读它,“就是题旨有某种人生意义或政治意义以致应时的或

重大的直接政治意义,但作者感情淡漠或虚伪作态,文字没有实感,也很难读下去。”胡风的职业病甚至达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对作品中的人物受到打击和扼杀感到和活人的肉体生命受到打击和扼杀同样的愤慨和伤痛。”反驳来自香港的完全政治化批判、写作长篇答辩《论现实主义的路》,可谓是胡风职业病的极端发展,对此,胡风发出了这样苦涩的自嘲:“念念不忘文艺本行,好像不这样拼一下就会使全国解放延迟一年半载,对国统区受苦受压迫的人民不起似的。”“百万解放大军正以撼天掀地的气势横扫蒋家残兵败将,而我,仅仅揪住万里长江挟泥沙以俱下的其中几点文艺泥沙(即使是泥沙),死死不放,好像就是被蒋家猎狗抓去以致殉了,也是为争文艺上的是非真假而殉的,并不枉此一生似的。”^③胡风对自己职业病的自嘲俨然为韦伯对学术人格的描述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作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④胡风就是这样一个怀着“情热”(胡风语——笔者注)的人。无论对手如何“请”和“逼”,他始终都不曾存过为了“过关”而胡乱表态之心,务求做到自己“心安”,即使客观上难以同时获得“理得”。这就是因为他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的每一行文字、每一次论争,以及上书和众多的汇报材料上。

胡风的这种“偏好偏恶”同时还表现在待人接物方面。对他认为“是真诚追求的有才能有成绩的作者”,胡风颇有鲁迅遗风,对他们关心帮助惟恐不够。但在另一方面,胡风也承认,“对感情不能投合的人,连应酬性的见面都受不了。”^⑤在《简述收获》中,胡风似乎已经大彻大悟,但想得开未必做得到,胡风在待人接物

方面不敷衍、不应酬、热情如火又嫉恶如仇的秉性即使在历经数十年的磨难以后也丝毫没有改变。1979年，刚刚出狱的胡风就再次让老朋友楼适夷领教了一回他热情耿介的脾气。在走出禁锢以后第一封给这位阔别了二三十年的老朋友的信中，胡风只字未提别后自己的情况，在简单问候之后就“马上进入正题”，提到三件大事：建议彻底重评冯雪峰、为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之拨乱反正出谋献策、告知向中央反映“口号问题”情况之事。读着这样的一封信，楼适夷觉得“全身的细胞都感到激动”，因为他的第一感想就是：“好家伙，这不依然是上书三十万言的胡风吗？二十五年的烈火焚烧，严冰冻结，好像孙行者关进老君炉一点也没有损伤了他精神上的毫毛。他一句话也不提自己，满腔满脑还是想的文艺建设的大事业。”³⁹

胡风所谓的“偏好偏恶”事实上有很明显的指向性。“偏好”偏在文艺及其出色的工作者，“偏恶”则重在他以道德眼光加以打量的世俗政治和政治文化人。胡风的“偏好偏恶”恰好与何其芳、周扬等人的轻重缓急标准形成鲜明的对比。胡风的《出西土记》是胡风在抗战结束之后准备离开重庆重返上海之前的日记。胡风在1946年2月21日的这一天日记里记叙了这样一件事：胡风正在清理东西的时候，何其芳来了。照例一脸微笑地问了胡风的行期以后，就提到他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章，要胡风说意见，说他自己有些地方不放心。下面是胡风当时心境的记录：“这真是一个老实人，整个局势是兵荒马乱，我自己的心情也是兵荒马乱，怎样有时间来做这样不急之务的讨论呢？而且，就是搁下几个月再谈，未必文艺的‘政治性’就睡觉了吗？”⁴⁰对照胡风一生亲历的系列论争，胡风日记里所提到的“一篇长文章”应该就是何其芳发表于1946年2月13日《新华日报》上的《关于现实主义》一文，这是何其芳与王戎关于“文艺的政治性”论争的重要文章，它是重庆《新华日报》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缺席批判的关键组成部分。何

其芳在“兵荒马乱”的时节特意来征求胡风的意见,可见他是将之看做一件非常严肃重要的事情,而却被胡风嘲笑为“不急之务”,这跟胡风后来自嘲的在解放军摧枯拉朽地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关键时刻,还死抓住几点文艺泥沙不放的心情截然相反,其中最明显不过地表现了胡风和何其芳不同的个性和人格特点。

因此,将胡风和周扬、何其芳等人分别视作学术和政治人格的代表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入探析胡风事件的成因。可以初步断言,在胡风事件的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两种不同人格的人分别越出了各自的职业疆域,有意或者无意地试图将在各自领域里适用的规则与逻辑不加任何限制地推行到对方的领域中,从而酿成了纠缠与冲突。但胡风事件的复杂性并不在于学术与政治的越位与纠缠本身,而是在事件发生的时代,这种越位与纠缠的产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尽管胡风基本上属于学术人格,但他身上秉承自传统的天人合一世界观必然会驱使他发掘自身内在的力量更好地变革社会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从而注定了他不会安于纯粹书斋式的学术生涯。而中国近代忧患的历史现实又加强了胡风这种走出书斋的选择的合理性。虽然胡风也听从了秉性的召唤,选择了从事文艺活动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但这种事业仅仅是更宏大的济世目的的手段而已。以文艺活动济世,最后必然从文艺活动进入到济世,即泛化的政治:按照韦伯的区划,政治家针对具体事务应该具有鲜明的立场,但他必须能够接受来自不同立场的批评。同时,政治家也不再适宜同时担当教师的职责,更不能袭取和利用教师超越具体立场的“科学的”声誉。但在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领袖和导师功能集于一体的传统期望,政治家所用的“利剑”和“工具”式的言辞却要求得到“科学般”的尊崇而不习惯于接受批评。由于政治给人一种可以包揽科学与学术的错觉,它也就很容易遗忘了它还应该给学术留出一定独立空间的必要。因此产生的学术与政治由越位而产生的错位、纠

缠和冲突,才是酿成胡风事件的重要原因,而事件的悲剧性质又昭示了学术与政治在本质上的歧途。

六、简短的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作一小结。胡风事件的产生,理论方面的原因至少有三个: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存在着裂缝与矛盾,人们对“政治”一词的理解充满歧义与含混,胡风与他的批判者的个性人格分属两个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因素归根结底说起来,都反映了文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纠缠与歧途。

-
- 注 ① Lin Yu-sheng, *The Morality of Mind and Immorality of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Lu Xun, the Intellectual*. In Leo Ou-fan Lee, ed. *Lu Xun and His Leg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第 123~127 页。
- ②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 1999 年 9 月,第 230 页。
- ③ ②④⑤⑦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 1998 年 11 月,第 105~117、37、105、118~119、167、23~24 页。
- ④ 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2 卷 第 502 页。
- ⑤ 胡风:《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2 卷,第 540、544 页。
- ⑥ 胡风:《如果一粒麦子死了》,5 卷,第 100 页。
- ⑦ 胡风:《在上海》,3 卷,第 376 页。
- ⑧ 胡风:《逆流的日子·序》,3 卷,第 171~172 页。
- ⑨ 胡风:《从开花到结果》,5 卷 第 121 页。
- ⑩ 胡风:《鲁迅还在活着》,4 卷,第 184、183、184 页。
- ⑪ 胡风:《祖国爱·人民爱·人类解放》,4 卷 第 207 页。
- ⑫ 胡风:《关于鲁迅的杂文(一)》,6 卷,第 56~57 页。
-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6 卷,第 215~217、298~299、152、381、123~124、127~134、153、307、152、136、305~306、98 页。
- ⑳ 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踏》的初版附记里说,他在受到批判的最初,“在个人心情上,本不想再说什么,因为要说的话都已多多少少或吞吞吐吐地说到过,复述既无意思,批判地加以发展吧,又感到无力。”在后来决定着手答辩以后,又“一想着手就感到颇为麻烦”,诸如“我们每一句话都要对群众负责”,原本只有一句话,“现在要分别解释原来负得起责的每一句话原来为什么负得起责,

现在为什么负不起责,怎样才负得起责,为什么负责,等等,这该是多么艰巨的工程。”两篇长文的篇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蔓延开去”的。见3卷第573~575页。

- ⑮ 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第629~630页。
- ⑯ 尚延龄:《胡风文艺思想新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 ⑰ 绿原:《胡风与我》,见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539~541页。
- ⑱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见《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87页。
- ⑲ 胡风:《从实际出发——再检查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态度问题》,6卷第750~751页。
- ⑳ 胡风:1952年2月8日致绿原信,9卷,第374页。
- ㉑ 胡风:1948年10月26日致舒芜信,9卷,第533页。
- ㉒ 胡风:《我的自我批判》,6卷,第477页。
- ㉓⑳㉔㉕ 胡风:《简述收获》6卷,第620~622、679~680、615、602、676、653~654、646~647、603页。
- ㉖ 胡风:《关于乔冠华(乔木)》,6卷,第521、525页。
- ㉗㉘ 李离:《五十年代初期的胡风》,见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801页。
- ㉙ 楼适夷:《记胡风》,见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2~4页。
- ㉚ 胡风:《出西土记》,4卷,第121页。

[王丽丽 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100871]